

序跋精萃

寻找一个“君子儒”

书同

近二十年来，我一直在苦苦“寻找”一个人。这个人，他终生只做了两件事，读书和教书。他从乡村私塾，一直读到省城，再读到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，继而漂洋过海，先后就读于美国的三所大学。计算下来，他的五十五年人生，差不多一半时间，都在做苦学生、穷学生。剩下的将近一半时间，他都在做另一件事：教书，从初设立的私立南开大学，到刚由南京高等师范转型组建的东南大学，继而应聘到曾经就读过的哈佛大学，最后执教于国立浙江大学。临终前两个多月，他还在住所带病为学生讲课。

这样一个苦学生，一个穷教书匠，他却看重物质，竟说过“让有一人非为金钱而来美”的极度清高的话；他也不稀罕所谓名誉，一生读书、教书，却不轻易落笔写书，到死也没发表过几篇文章。他的友人称他是“大的小孩子”；他的美国弟子引孔子的语，称他为“君子儒”。

这个人，就是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，现代教育家，“《学衡》派”创始人之一梅光迪。

《论语·雍也第六》记孔子对子夏说：“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”大概这是“君子儒”一词最早的记载。对于“君子儒”，通常的解释是“高尚的儒者”。但也有各种别的解释。纵观孔子关于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的多种表述，如“君子不器”、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、“君子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、“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”、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，还有“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；小人反是”、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”等等，可见释“君子”为“高尚的人”，大体不错。我在考订、撰写《君子儒梅光迪》一书时，大体上遵循上述关于“君子”的释义，努力还原一个“高尚的儒者”形象。

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农历正月初二，梅光迪出生于安徽宣城。他出生时，正赶上所谓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清末末年，其一生之幸以此，不幸也以此。1910年，他与胡适、竺可桢等一同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，因理科成绩不佳落榜。第二年继续奋斗，终于被录取。

因为创办《学衡》，以及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言之争，梅光迪被视为“顽固”“守旧”。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。他重视国粹，但并不排斥西方文化（文明）。而他的重视国粹，实际上主要是偏爱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人文思想。他曾作《孔子的风度》一文，赞孔子的人品为“极则”。据他研究，孔子最恨三种人：一为贪官蠹吏；二为自命放达、玩世不恭，而实一无所长者；三为乡愿，即所谓“德之贼”。

读诗忌崎岖求之

顾农

朱熹《诗集传》卷首有一篇《诗传纲领》，引用《毛诗大序》《尚书·舜典》《周礼·大师》《礼记·王制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以及前辈理学家程颢、张载、谢良佐等人的意见，作为解释和阅读《诗经》的指导原则，这里有张载的两段高见道——

求《诗》者贵平易，不要崎岖求合。盖诗人之情性，温厚平易老成。今以崎岖求之，其心先狭隘，无由可见。

诗人之志至平易，故无艰险之言，大率所言皆眼前事，而义理存乎其中。以平易求之，则思通以广，愈艰险，则愈浅近矣。

所谓“崎岖求合”是指通过某种艰难复杂的路径去追寻原诗深意，往往形成过度诠释，貌似新奇高雅，其实已远远离开了原诗的实际。这种情形，人们也看得多了，

遂见怪不怪，甚至信以为真。即如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，自毛《传》以来，总是解释为咏叹“后妃之德”，“《关雎》乐得淑女，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。窈窕淑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，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”诗之首章云：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毛《传》解释说：“后妃说（悦）乐君子之德，无和不谐，又不淫其色，慎固幽深，若关雎之有别焉，然后可以风化天下。夫妇有别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君臣敬则朝廷正，朝廷正则王化成。”《关雎》诗义之重大有如此者。

从河洲上的水鸟，说到君子淑女，又突然上升到朝廷、王化上去，岂止是“崎岖求之”简直是三级跳或撑杆跳啊。

鲁迅先生在《门外文谈》里曾经说起这首地位显赫的《关雎》，半开玩笑地写道：

……它是《诗经》里的头一篇，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，假如从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，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，到无论什么副刊去投稿试试，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。“漂亮的好小姐呀，是少爷的好一对儿！”什么话呢？

事实上诗的原意也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即使要引申发挥，亦不宜过远；而一旦曲意求深，那就不得了，什么君臣、朝廷、王化，全都隆重出场，非磕头佩服不可了。

理学宗师朱熹实在是个很接地气的明白人！他的《诗集传》，对毛《传》多有抵制，思想算是比较解放的；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解读《关雎》，仍然说这里的淑女“盖指文王之妃大姒为处子时而言之也”，“君子，则指文王也”。可知他仍然在崎岖小道上努力向上攀登。世界上的情形往往是道理不很难懂，而实践不容易跟得上，虽大宗师有时也难以自免。

他又引述英国大儒狄更生的话，分人为两种：一为禀性狷洁，专与众人立于反对地位，自取失败，自蹈祸机，一事之来，则左右顾虑，无实行能力，而于实行家之言动，则吹毛求疵，引起其热烈反感。自古大宗宗教、大革命家、大思想家、大艺术家，皆属此种。另一种人，和光同尘、随时俯仰，以成功为其准则，故生于尚武时代，则为军人，生于宗教时代，则为僧尼，生于拜金之现代美国，则为银行家，为巨商。这第二种人，即中国所谓“乡愿”。

无疑，在做入立场上，他向孔子看齐，唾弃乡愿，一生要努力做一个重精神轻物质、重独立不附和的“正人君子”。

1913年7月3日，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油谓古今大人物为人类造福者，皆悲观哲学家，皆积极悲观哲学家。何则？彼皆不满足于其所处之世界，寻出种种缺点，诋之不遗余力，而立新说以改造之。孔、老、墨、佛、耶、路得、卢骚、托尔斯泰及今之社会党、无政府党人皆此一流。”还说，尚有一种消极悲观哲学家，以人世为痛苦场，为逆境，而以嬉笑怒骂或逍遥快乐了之，如杨朱、Epicurus（伊壁鸠鲁——编辑注）及吾国之文人士皆属此流。

但他的思想之新，还不限于此。他说：“有悲观而后有进化。西洋人见人生种种痛苦，思所以排除之，故与专制制，与教会战；见人生之疾病死亡，遂专力于医学；见火山之爆裂，遂究地质；见天灾之流行，遂研天学及理化。此皆积极悲观，因有今日之进化。吾国数千年来，见人生之种种痛苦，归之于天，徒知叹息愁苦而不思所以克之，此纯属消极悲观，所以无进化也。同一悲观，一为积极，一为消极，收效相反至于如是。明于此，即可知中西文明与人生哲学之区别矣。”还意犹未尽地说：“今人多谓西洋人生哲学为乐观，东洋人生哲学为悲观，而不知皆为悲观，特有积极消极之不同。此道所独得之见。”

我1994年第一次走进梅光迪的故乡，那是皖南青弋江畔，一个叫西梅村的极普通的小村落。后来又沿着他求学、工作的足迹，去安庆，去上海，去南京，去杭州，去贵阳，去遵义，去美国，每一次探访，都似乎更走近他一步。2015年春，为纪念梅光迪逝世70周年，我写了《君子愈多，则社会愈良》一文，发表在文汇报“笔会”上。文章被在福州的老同学孙汉生兄读到，他建议我用这种体例和笔法，写一本梅光迪的小书，由他们来出版。我深受感动和鼓励。

2017年夏，《君子儒梅光迪》书稿完成后，我来到遵义，见到梅光迪

当年房东李筱荃的孙女李永颐。老太太已八十六岁，但思维敏捷，耳聪目明。她说：“梅光迪长得很帅，是个美男子，爷爷叫我喊他‘光迪伯’，喊竺可桢‘竺爷爷’。”我说：“梅光迪与竺可桢是同年，都是1890年出生，为什么一个叫伯伯，一个叫爷爷？”她爽朗地笑着说：“我也不晓得嘛。”

贵阳黔灵公园是梅光迪的长眠之地。墓地被一丛矮灌木遮蔽着，无声无息，如果无人指引，颇难发现。梅光迪的名字刻在一方石碑上，碑前放着几枝残菊。站在墓旁，我不禁想起竺可桢所撰挽梅光迪的对联：李杜文章陶明气节公自大名垂宇宙，黔山埋骨湘水招魂我来万里哭朋侪。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好、更恰当的语言，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。

因为梅光迪，我有幸结识许多朋友，包括最早提议我写梅光迪传记的段怀清兄，编著梅光迪研究资料最多的眉睫老弟，帮助查阅《学衡》等资料的沈卫成教授，协助搜寻梅光迪藏书的沈杭春先生，帮助联系梅光迪房东后人的周远德兄，等等，不能一一提及。在这些师友中，梅光迪亲家梅铁山老师，梅光迪长孙梅务虚先生，给予鼓励帮助尤著。当我那天把《君子儒梅光迪》样书送到务虚先生手上时，一向不善交际的他，请我“一起去小馆子坐坐”，几天之后又电话告诉我：“你把事情都讲清楚了。”这些点点滴滴，时至今日，依然历历在目，让我时时想起梅光迪的“君子之风”。

“君子愈多，则社会愈良”，这是梅光迪一贯坚持的“人学主义”的观点。他在1916年12月28日给胡适的

信中说：

孔子之言曰，君子修其身，而后能齐其家，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……欲改良社会，非由个人修其身，其道安由？……吾国文化之“人学主义”（Humanistic），故重养成个人。吾国文化之目的，在养成君子（即西方之Gentleman and scholar or humanist也）。养成君子之法，在克去人性中固有之私欲，而以教育学力发达其德慧智术。君子者，难为者也。故无论何时，社会中只有少数君子。其多数乃流俗（The profane vulgar）而已。弟窃谓吾国今后文化之目的尚须在养成君子。君子愈多，则社会愈良。

这些话，是正当“实用主义”大行其道，多数人习以政客为荣、以成富商为能的时代，自然显得“不合时宜”。但其可贵处，也许正在此。他去世后，老同学、老同事宁可愤慨叹息：“目今贪污之风盛行，欲求名利而不孳孳以求已属上乘，而何况不要名乎？但因陈义过高，故曲高和寡。”忘年交贺昌群说：迪生人品纯洁高华，而不失可爱，是一个“大的小孩子”。他具有政治家的胸襟，而绝不想也不宜做一个政客，做政客，必具三条件：一要身体好，个人的时间精神乃至饮食起居，都不由得自己支配；二要有口辩，临机应变，应对如流，内容尽管空虚，甚至无中生有亦可；三不可有学问，有学问必辨是非真伪，不能寡廉鲜耻。而此三者，迪生无一具备。

哲人已逝久矣！行文至此，我的耳畔似乎再次传来百年前那个声音：君子愈多，社会愈良；君子愈多，社会愈良。

2019年11月7日改定



旧窗（凹版）安吉尔·埃斯提里亚诺夫 [保加利亚]

林徽因的字

陈老萌

题目不说“林徽因书法”，却道“林徽因的字”，是她从不把字当书法来书写，也从未以手泽“雅正”于人。虽然她父亲林长民的书法名噪一时，还曾一度鬻字解困；虽然林徽因的字远胜于许多女性作家的墨宝，甚至胜过某些自诩书法家的男性。

林徽因留存的手迹为数不少，大体是手稿、信札，除幼年家书，几乎全用硬笔。显然她自小临过碑帖，那时高门闺秀不练练字的很是罕见。林徽因的字脱俗硬朗，不像她容貌的姣好、身材的纤细，恰符合她内心的刚强坚韧，仍算得上字如其人。大概临帖终究没有坚持很久，未得进入书法境界。比之同辈女作家的字，不及凌叔华，较谢冰心似也稍稍逊色。

故旧刘绪源先生在世时曾寄我落款“林徽因”的对联照片，替他收藏界友人俯询，看是否林氏真迹。什么字忘了，那字实在不敢认定出自才女笔下，只得以“不像”奉复。这些年来，林徽因持续遭人“绑架”，并非林徽因的书信，并非林徽因的言语，并非林徽因的译作，并非林徽因的字画，却不断被强按到她的名下。特别是那些字画，好事者难掩借林谋利之心。有说她的“一张诗稿卖了80万”，重利之下必有敢冒不韪的人。近期网上流传若干林徽因“墨宝”，此试举一幅扇面、两副对联说说。

扇面录元代画家吴镇的七言古体诗《李成江村秋晚》，署才女大名而可疑处颇多。它没有标明所录诗出处，落款亦无纪年，更谈不到书明季节的题识，仅仅光秃秃姓名三个字，十分突兀，不明所以地半空落下这一百一十字楷书。这不大合乎扇面作品惯例，要它它专

如何有心境书写空山里黄鹤白雁？题款“福州客中”的一个“客”字更是破绽，闽地本是林徽因原籍，何来“客”的身份。至于“仲冬”与“十二月”，只需写一个即可，现在并列，叠床架屋。两者相忤亦一目了然，按农历，仲冬不在十二月；依公历，不当再题壬午。以林徽因文化素养，必不会画蛇添足，何况“画”得这么低级。再补一句，纵观她各个时期书法，从无褚体笔意，连教她习字的书法家父亲，虽留墨不少，亦并无一幅呈褚体风貌。

所谓的林徽因书法，既然售价吓人，难怪又出现了依据这副伪作制造的赝品——伪作竟然还有赝品，且不止一件，实为奇观。其中一件特意钤上两枚名章，阳文、阴文各一方。字嫌木滞，还将伪作原件“因”字改成“音”；另一件，福州改成“播州”。播州为遵义古称，然林只客居过昆明、宜宾。作伪何等漫不经心。

另外一副署林徽因名的楷书对联，写“水清鱼浅月色界香尘正观”“花静鸟谈天雄文直道当世”，联语杂糅前人之句，夹缠不通。款识云“癸未春暮……于海上”，癸未系一九四三年，与前副的不可信一样，那时林徽因仍未离开李庄，“海上”两字虚妄得很。旁的话不啰嗦了。

字画造假古已有之，从前仿冒，务求酷似，够世人费劲去考证鉴别。而今日仿冒手法低能粗疏，却仍能招摇过市，怎不叫人感慨。元宵夜阖家暖意融融，新春试笔而生今昔之叹，实在不合时宜，打住。

1981年，李健吾先生为纪念郑振铎先生而写了一篇《忆西谛》，其中写道：

我眼前摆着你送我的结婚礼物：老式的“镇尺”，将近一尺长。本来是一对，经过十年浩劫，书桌上留下这一只了，多可贵的孤零零的一只！它的伙伴又哪儿去了呢？它们能像春天的鸿雁在高空排成人字飞来吗？我没有能力查，也不愿意问，不过明明是一对，上款和下款统统在失去的那一只上，如今就剩下这一只，刻着各种文体的古字，旁边还刻着现代语言的文字，落款是“荃父”，还有一个小小印章。“荃父”是谁呢？我的浩瀚无边的记忆之海忽地跳出一个“姚”字。难道陌生者姓姚？……如今只有孤单这一只，可是单这一只就有多重的分量啊，是铜的！

李先生对郑先生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。不过，年纪大了（第二年李先生就逝世了），有时候记忆就未必可信。例如，郑振铎送的这对镇尺，明明并没有失散，在取名为庚信“韩山一片石”或韩愈《山石》诗的某作家写的《李健吾传》中，就印着这对镇尺的照片。而且，上款和下款也并非“统统刻在失去的那一只上”，而是分别刻在两只镇尺的下部，一刻“健吾先生雅玩”，一刻“郑振铎二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”。

镇尺，是以前文人，尤其是书画家的斋室里，常用或必用之雅物。我的父母亲都不是文人，父亲小学也没读完，母亲连小学门都没进过。他们都只是做毛笔的笔工，但我从小家里就有一只铜的镇尺，一直就拿来玩的。稍微长大一点后，我去父亲工作的笔庄玩，曾看到店堂里有大大小小很多铜镇尺，才知道它的主要功用是用来压纸张，也知道了镇尺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。父亲是一个极其诚实甚至刻板的人，平日里连公家的一张信笺都不拿回家的，他做了一辈子毛笔，但我小时读书写毛笔字的笔，都是从街头小文具店里买的（父亲认为小孩子练字不必用太好的笔）。那，我家里孤零零的这一镇尺，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有这个疑问，但一直没有问过父亲母亲。

没有问过父亲的，还有这镇尺上的文字。“高情润碧与山红”，这个草书的“润”字我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不认识，觉得好像是三点水加一个罗，但又没有这个字啊，于是就猜想应该是“河”字，虽然又觉得这样写有点别扭，但私下以为“河碧”与“山红”也很对仗。反正，因为父亲文化程度不高，我一直没问过他，当然更不会问他这句诗的来源。现在，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多年了，想问也问不到了。我平时并不铺纸挥毫，现在更是连钢笔、圆珠笔也少用了，因此这镇尺也基本不用，只是作为父亲的遗物，搬了好几次家也一直留在身边。

我自己一直读到了大学，读到了博士研究生，当然早就知道了“高情润碧与山红”作为一句诗联，必是下联。那么，它的上联是什么呢？我曾经拟写过很多句，但总不能弥补不知道原来上联的遗憾。随着阅读的增加，我后来又知道了“润碧”与“山红”的出处，就是韩愈《山石》诗里的“山红润碧纷烂漫”，连苏东坡都喜欢韩退之这个意境，写诗云：“葦确何人似退之，意行无路欲从谁？宿云散晓晨光漏，独见山红润碧时。”

那么“高情润碧与山红”又是谁写的呢？我也曾在电脑上搜索过“基本古籍库”等，都没有找到。然而，有一次我翻阅清人查慎行《敬业堂集》，读到《长律一章寄祝座主清溪徐公九十九寿》一诗时，竟在无意中看到了出处！该诗是排律，有五十韵百句，一韵到底，多为精彩对偶，篇幅很长，这里只截取数句：

吴兴自昔多耆旧，人瑞今归九十翁。古殿灵光尊海内，岁星耀耀在江东。……什袭有囊多锦制，留题无壁不纱窗。遍栽桃李开芳径，新茁芝兰压旧丛。雅量风清兼月白，闲情润碧与山红……

原来，原句的第一个字不是“高”而是“闲”！电脑是死板的，你差一个字，就查不到了。查慎行所歌颂的，是他在四十多岁好不容易才考上举人时的座师徐倬。徐倬是吴兴（湖州）人，而湖州正是我的故乡，也就是天下闻名的出湖笔的地方。吴兴自古多文豪，但再伟大的文人也是离不开笔工制作的笔的。这样一想，好像我家这镇尺确实也与先父是有缘的了。现在，那句诗的上联也很清楚了。“雅量风清兼月白”句，我认为出于宋人陈抟《河洛真经》的“一朝云起卷还舒，俱是风清并月白”，古文中“并”就是“兼”啊。

在我写这篇拙文的时候，又受到友人启示，在互联网上查到“雅量风清兼月白”一联，在山西省已有三处古迹或旅游景点，早就用作楹联了。那就是阳城的皇城相府南书房，五台山的显通寺钟楼，忻州定襄县的阎锡山故居。而且，三处楹联下联的首字都是“高”。当然，所有这些地方的介绍文字，都没有指出这副对联的作者和出处。所谓皇城相府，就是清朝名臣陈廷敬的故居；而陈氏也正是查慎行的恩师，正是陈氏向康熙皇帝推荐查氏的。因此我猜想，当是查慎行又将此联书赠陈廷敬，并将“闲”字改为“高”的，尔后，此联便在山西传开了。而拙文上面提到的李健吾，及《李健吾传》的作者，也都是晋人。谈查氏此联居然涉及这么多山西人，亦一趣事也。

我在浩瀚无际的脑海中冲浪，忽又想到，那刻有“雅量风清兼月白”的镇尺，一定也还存在于世间的，我慢慢寻访，也许总有一天它也会出现，与我家的镇尺一起“能像春天的鸿雁在高空排成人字飞来”……

笔会

「文汇报」
微信二维码